

闽东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

中共宁德地委党史办

闽东是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之一，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实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共产党组织在闽东地区成立，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闽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全国、全省的革命史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一)

闽东，地处福建东北部，包括今宁德地区的福安、福鼎、宁德、周宁、霞浦、柘荣、寿宁、屏南、古田九县和今属福州市的连江、罗源两县，北拱群山，南濒东海，古称“闽浙之左塞”。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有一批在外求学的闽东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陆续返回闽东各地，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和发展革命群众组织。一九二七年六月，古田县成立了闽东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中共古田县特别支部（书记陈炳），发展党员四十六名，进行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会的活动。福安柏柱洋也组织了农会，会员二千余名，遍及七十多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自领捐税，农民分摊”的口号，进城请愿，反对地主豪绅包捐勒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刚刚兴起的闽东革命斗争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摧残，在宁德活动的共产党员郑长璋被害于福州，白色恐怖笼罩着闽东。

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红四军入闽，推动了福建革命斗争的发展。闽东革命之火重新燃烧。在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下，这一年的下半年，福安、连江两地县委先后成立，两个县委分别向邻县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瓦解土匪和消灭反动民团；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寿宁、屏南以及罗源、宁德、福鼎等县农村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一九三一年，邓子恢同志三次巡视闽东，与当地党的领导同志一起，把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组织了福安溪柄一带的“平案”斗争和连江透堡的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此时党领导的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的革命群众运动，也在闽东各地蓬勃开展。

为了把斗争推向深入，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指示福州中心市委，加强对连江、福安“正在发展着的广大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领导^①。福州中心市委作出决定，在这两县“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②。同年六月，省委军事部、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亲临福安、连江，指导闽东工农武装斗争。七月，叶飞同志以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的身份巡视连江、福安、宁德等地，指导工作。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闽东革命开始由发动“五抗”为内容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以建立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直至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

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和第一支队分别在连江县官坂合山村和

福安县溪潭双阳村正式成立。十三支队队长王调勋、政委杨而菖；一支队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这两支工农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闽东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一支队主动出击，活跃于福安北区、西区、东区、上南区及寿宁、周墩等边界地区；十三支队则以连江长龙山区为中心，迅速向蓼沿、小沧山区发展，积极开展连罗山区的游击战争。

(二)

由于连江游击运动的发展，福安游击队的扩大，开展闽东的游击运动已初步实现了。为使闽东、闽北的游击运动打成一片，争取福建全省苏维埃的胜利，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作出“进一步开展福安、连江游击运动，创造出闽东新苏区”的决议^③，并陆续派叶飞、邱小村，江平、曾志、赖金彪、任铁峰等同志来到闽东，充实和加强党的领导。同年十一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统一领导福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五县的革命斗争。

一九三三年春，党领导下的一场以打土豪、分粮食为主的群众运动在闽东各地迅速展开。各县普遍成立自卫队、分粮队等组织，出现了“成千成万的贫苦农民象潮水一样涌进共产党队伍来”的新局面^④。为解除当时反动大刀会对革命的威胁，闽东党组织还发展了一种群众性自卫武装组织——红带会，先是在寿宁大安成立，继而遍布寿宁广大农村，并向福安、霞浦、宁德等县发展，人数最多时达十万人左右。寿宁红带会员相继举行武装暴动，攻打猪母洋、先锋、南阳、坑底等地驻敌。在霞浦青蛟、陈墩地区的二百六十一个村庄也爆发了有一千五百余名红带会员参加的暴动，镇压了一批恶霸、豪绅。宁德霍童和福安甘棠暴动也接连告捷。福鼎店下、前岐一带也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闽东工农游击第一、第十三支队积极配合群众斗争，先后围攻溪柄国民党驻军，消灭反动大刀会，截击伪警察队，粉碎敌人对连罗地区的三次“围剿”，打垮十八个地主民团。在群众斗争的烽火中，前后又建立了第三、五、七、九等四支闽东工农游击队。

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促进了闽东各地工农红色政权的建立。自一九三三年五月到这年年底，成立了寿宁、福安、宁德等县红色政权和数以百计的村革命委员会以及局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农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遍布全区农村。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所辖五县县委相继成立，还成立了福霞、福寿、宁德三个边委；前后共建立七支工农游击队和数万人的地方群众武装。至此，闽东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这时，原驻守闽东的部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外调参加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兼之“闽变”，闽东反革命力量暂时削弱。闽东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发动全区性的工农武装暴动，成立“闽东红带总队”和赤卫队、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消灭闽东境内的反动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风暴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全区，连罗游击队和工农群众一举攻克马鼻镇，旋即占领了四个区，并在透堡乡成立连江县苏维埃政府。福安中心县委领导赛岐暴动成功，造成我军威逼福安县城之势。接着，闽东工农武装两度围攻霞浦县城，随后又占领了柘洋和福鼎重镇秦屿，并攻陷寿宁反动堡垒、交通枢纽南阳镇，威震闽浙边区。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全区性革命政权——闽东革命委员会宣告建立了。福安中心县委所辖五县区域内建立了“三、四百里苏区”政权^⑤；连江县所占领的区域占全县一半，“全县的农民都自动起来挂红旗”^⑥。各县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同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团长任铁峰、政

委叶飞)和独立十三团(团长魏耿、政委陈祥榕、参谋长杨采衡),分别在霞浦西胜和连江透堡成立。同时在福鼎、福安、连江等县沿海一带建立了三支海上游击队。不久,又由曾志前往霞浦西洋岛,收编柯成贵自发武装为闽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闽东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同年二月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福安柏柱洋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以马立峰、叶秀藩为正、副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政府内设土地、财政、粮食、文化、军事、肃反等部,下辖福霞、安德、安福、福寿、霞鼎、连江及随后成立的罗源、周墩、霞鼎泰等九个县苏和四十二个区苏,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领导近百万的苏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分田运动。曾志同志参照闽西苏区的分田政策、经验,起草闽东苏区的分田大纲,并在福安柏柱洋进行试点,而后以“梅花形”、“波浪式”的方法全面展开。当时,“全区分田的地方遍及柘荣、宁德、霞浦、寿宁、连江、罗源等县”^⑦,全苏区有五六十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农民每人分到的田,“至少一担,多则七担”^⑧。

一九三四年六月间,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遭敌破坏,闽东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在叶飞同志主持下,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领导人于福安柏柱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由书记苏达(九月后由詹如柏代理)、组织叶飞(原为曾志)、宣传马立峰及委员詹如柏、阮英平、小阮、林孝吉七人组成。特委下辖福霞、霞鼎、安德、安福、福寿、宁德、连罗、福鼎、寿宁九个县委和福安县城白区特支,共有二十八个区委、五百七十个支部、二千二百三十余名党员,办有特委机关报——《闽东红旗报》^⑨。十月初又成立了罗源县委,特委还派员到屏南和浙江泰顺、平阳等县开展工作,扩大苏区。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的成立,使闽东革命斗争有了一个统一领导核心。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根据地广大军民,大力开展苏区建设,实行保护商业、自由贸易、买卖公平、储备粮食、优待烈军属、保护耕牛、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政策;还在连江下宫设立闽东后方办事处和交通站,组织闽东船民工会,进一步沟通了闽东山海交通以及闽东苏区与外地的联系,促进了商业往来。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又有正确的政策,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农副业生产高潮。在根据地内设立军服处、修枪厂和后方医院,开设各种供销合作社,印发钞票,繁荣苏区经济。并广泛宣传禁赌、禁烟(鸦片)、禁贼;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废除缠足;“组织教育机关,扩大识字运动”,创办“列宁小学”和工农补习所;组织文艺团体“工农剧社”,“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指示新社会的光明”^⑩。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也得到很大发展,整个苏区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闽东,向闽东党介绍了中央苏区党、政、军建设经验,并在军事骨干、枪支弹药上支持了闽东红军。九月底,由闽东红军独立团和独立十三团组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宁德县支提寺正式成立,师长冯品太、副师长赖金彪,政委叶飞。全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连、两个独立营,共一千六百余人,九百四十多支枪。连同各县独立营、警卫连、赤卫队、红带会等地方武装,全闽东共有数万人的革命武装。闽东工农武装发展到高潮,苏维埃政权遍布闽东大片河山。

(三)

闽东苏维埃运动的全面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在闽东农村的反动统治,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惊叫:“闽东军事发展迅速,日来突飞猛进,为向所未有”,为此发了“歼匪”

电令^⑩。《福建民报》也载文哀叹：“闽东匪祸之深，实不下于闽西各县，而其中尤以福安、连江、罗源、霞浦各县为甚，且侵入久称怡静的福鼎了。”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密谋策划，于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纠集了闽浙两省三万多正规军，加上各县区保安队、地主民团，总数不下六万人，对闽东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反革命“围剿”，重点进攻福安、连江。敌人采取与“围剿”中央苏区相类似的战术，先占领军事要地，分割苏区，然后筑碉堡、挖战壕，配合地方反动民团、大刀会占据大小村庄，组织大批机动兵力齐头并进，围歼我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在敌人猖狂进攻下，连罗苏区被封锁，失去与闽东其他苏区的联系，闽东苏区首府福安柏柱洋以及甘棠、溪柄、柘洋等地相继陷落，部分苏区也沦入敌手。敌人在其占领区内施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量捕杀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抢掠财物，烧屋毁林，强迫移民并村，建立“连座切结”的保甲制度。苏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围剿”，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号召闽东革命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烧杀政策和白色恐怖，规定“一切苏维埃工作应服从战争”的需要，要求全体党团员紧急“动员起来加入前线去，领导、武装群众，抱牺牲精神，勇敢和敌人拼个阶级的死战”、“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战，为争取全闽东以至全中国的苏维埃胜利而战！”^⑪

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响应特委号召，踊跃投入反“围剿”斗争。闽东独立师在成立后，半个月中，就“冲破敌人主力，消灭数处整个民团，缴枪二百余支，开辟了宁罗方面的新苏区，掀起古屏方面的革命浪潮，成为秋收斗争中一支不可战胜的生力军。”^⑫独立师首战告捷，全歼宁德石堂反动民团，又在第十一支队的配合下，攻克周墩，成立周墩苏维埃政府，使得“穆阳豪绅地主异常恐慌，礪溪敌人撤退穆阳去，溪北敌人大动摇了”^⑬。各县地方武装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到敌人侧后方活动，破坏交通，消灭敌人爪牙，迷惑、麻醉、疲惫、牵制敌人，使敌处于被动的地位。”^⑭苏区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支前，参军参战，实行赤色戒严，配合军事行动。这一切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作战。

但是，由于闽东党和工农武装缺乏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加上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反“围剿”斗争处于被动地位。虽然闽东独立师和地方武装也取得一些局部胜利，却未能扭转整个战局。特别是苏维埃首府福安柏柱洋等地的陷落，使闽东党和工农武装急于收复失地，同敌人打正规战，拼消耗，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至一九三四年年底，闽东苏区大部已被敌占领，各县区之间交通联系中断，大部分县党政机关和警卫部队损失严重，独立师二团团长潘伯成同志在收复失地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苏区局面十分危急。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中共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实行战略转移的紧急会议，转变了单纯强调保卫苏区的基本立场，作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一月十五日，闽东独立师根据特委会议决定，在柘荣与福安交界的彭家山一带同五千多敌正规军激战一整天，敌死伤五百余，我亦伤亡一二百人。后因敌驰援，我军迅速撤出，转入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二月初，闽东独立师突破敌人重围，驻扎宁德桃花溪休整。是时，独立师仅有四百余人，副师长赖金彪也在一次反阻击战斗中英勇牺牲。闽东革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藩，以及连江、罗源县委书记林孝吉、阮在水等人因叛徒出卖相继被捕牺牲。由连江独立营扩编的西南团被迫转移闽中一带活动。三月上旬，西洋岛海上独立营遭敌舰包

围，营长柯成贵等百余人被俘。闽东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大片苏区政权得而复失，连罗方面也是元气大伤。闽东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依然中断，各地党组织大部分被破坏，闽东革命暂时处于底潮。

鉴于闽东特委多数成员被捕牺牲，特委领导处于半瘫痪状态，经叶飞同志提议，于五月底在寿宁含溪召开重要会议，重新恢复了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由叶飞任书记，委员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苏敏丹等。会议确定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一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面对内恢复老区；强调发展新区的方法应是部队行动与地方工作相结合。会议决定在游击战争环境中不提“苏维埃，分田地”的口号，对地主按田亩征粮，对大土豪根据其家产派款，只杀少数罪大恶极者；对民团武装和大刀会组织，采取政治瓦解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只要不为非作歹，红军则不予攻击；鼓励白区商人到根据地经商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会议还制定“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巧妙利用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掩护党和红军的活动。这些方针、政策的实行，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适应了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与新区的发展。八月间，闽东特委又在柘洋楮坪山上召开会议，充实、健全特委组织机构，确定设立霞鼎、福寿、鼎平、宁屏古四个办事处，下辖四个中心县委、十四个县委；将经过恢复、发展的独立师改为四个纵队，各以四个办事处驻地为主要依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在此期间，闽东独立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先后取得：宁德桃坑歼敌一连，福鼎槎枧盆全歼浙江保安旅一个加强连，袭击福安茜洋反动民团，在霞浦打垮敌新十师一个连、歼敌一排，化装袭击福鼎沙垵海关和水警、全歼守敌两个排和在周墩肖家岭溃敌三百余人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以寿宁岗垵、宁德梅坑、周墩竹洲山、霞浦柏洋为中心的几块苏区老根据地，还开辟发展了闽浙边和宁屏古一带的新区，建立了无数星星点点的根据地，并逐渐连成一片，终于扭转了战局，渡过了险境。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由闽东方面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原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组建）双方领导人组成，共十一名委员，并相应成立临时省军区，统一领导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浙南特委建立，福鼎县委划归浙南特委领导。在临时省委领导期间（历时一年左右），各地大力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广泛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至一九三六年底，游击区域南起闽江口，北达浙赣铁路沿线的金衢盆地，遍及闽浙两省七个行政区四十余县，建立了辽阔的根据地，英勇反击了国民党正规军两次各三四十个团、长达八个月的“围剿”，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及南方各省游击战争的开展。

（四）

一九三七年春，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的闽东特委，经多方努力，终于获悉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明确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此，闽东党组织开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东的建立进行不懈的努力。闽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军队番号和其他政策也作了相应改变，并在闽东各地迅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八月十九日，闽东独立师在宁德亲母岭英勇反击并全歼前来“追剿”的国民党省保安第三旅一个加强连，迫使国民党当局接受闽东特委的合作抗日和谈建议，经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郭文焕等同志与福建省国民党军政当局多次交涉，终于在年底达成

“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协议。一九三八年一月，闽东独立师一千三百余名将士集结于屏南双溪、棠口，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二月十四日，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挥师北上，抗日救国，并在宁德城关设立六团后方留守处。与此同时，战斗在福鼎一带的红军由粟裕等率领从浙南北上抗日；从连江转到闽中一带坚持斗争的杨采衡、陈云飞等也率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闽东特委调整、充实了组织，由范式人任书记兼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八月，范式人调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郭文焕接任闽东特委书记。抗战初期，闽东特委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员到福安船泊大队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打入国民党当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掌握抗日巡回宣讲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并争取伪县政府人员和开明绅士，开展统战工作。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悍然派兵袭击并逮捕我宁德留守处人员，接连制造了宁德梅坑、周宁黄坑以及政和寿宁交界的新坑口等事件，屠杀我抗日伤病员和干部、战士。一九四二年一月，又制造了宁德霍童惨案，惨杀我被捕游击队员七十三人，后又陆续杀害我游击队员二十三人，闽东武装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损失。这期间，闽东党先后在特委书记戴炳辉、罗富弟、左丰美、张翼，省委特派员王一平、刘捷生等同志领导下，在开展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重建和发展武装队伍，先后组建了闽东主力游击队、宁德县游击队、闽海抗日游击队、闽东游击纵队、古田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并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反顽自卫武装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袭扰和打击日寇，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发动内战，闽东党领导人民恢复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底，福建省党代会在古田等地召开，改中共福建省委为闽浙赣区党委，统一部署和领导爱国游击战争。一九四七年四月，古田澄洋暴动成功，成立了闽浙赣游击纵队，司令员左丰美，随即挺进闽清，攻打五龙峰乡公所后返回古田驻地整编；而后江作宇等人率二支队深入宁德、周宁、福安一带与黄垂明游击队会合，开展斗争；其余部队分赴南古瓯、屏古瓯活动。

一九四七年秋，阮英平回福建工作，兼任中共闽东地委书记。同年，城工部闽东工委及其所属各县基层组织建立；各地党组织也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先后组建和整编了浙南第三县队、闽东人民谋生军、屏古瓯游击队、连罗游击总队和闽东人民游击队等十几支武装队伍，转战闽东各地，广泛开展反霸分粮斗争，主动出击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与此同时，党领导下的各阶层人民“反内战、争和平，反饥饿、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

一九四九年春，闽东各地军民积极开展支前工作，主动截击国民党南逃溃军，迎接并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闽东各县。六月中旬解放了福鼎、古田、霞浦，随后接管了柘荣；六月下旬促使周宁伪县长投诚，周宁县和平解放；七月解放了福安、寿宁；八月相继解放了宁德、罗源、连江直至闽东全境的解放。闽东革命经过长期艰辛的历程，

(下转第68页)

为“水运仪象台”。这座巨型仪器的屋顶有九块活动屋面板复盖，是现代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其中浑象一昼夜自动旋转一周，为现代转仪钟（天文台的跟踪机械）的“祖先”；其报时设施在一组复杂的齿轮系统的带动下自动报时，其中的“天关”（擒纵器），是近代钟表的关键部件，所以它又是钟表的“祖先”。钟表擒纵器一直被科学界认为是欧洲人发明的，现在科学界已明确其发明权必须归于中国北宋的天文学家苏颂。苏颂创造了浑象的内部观察天体运行的设备，可以说是现代天文馆假天象的“祖型”。苏颂的上述成就，反映了我国宋代对天文观测、天象演示、报时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水平，对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苏颂在我国药理学方面也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为了核定整理宋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中国药书，组织并参加“编审局”，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首先增补完成一部《开宝本草》，嘉佑七年又编著了有名的《本草图经》，该书虽亡佚，但书中主要内容则散见于诸家本草。这部巨著是隋唐到元明之间医药学的桥梁，对宋代以后药理学名的考定帮助很大。他从各地采集了各种药物

标本，重新编绘，补充了久已失传的有图形的本草，使后来医药学者的学习和研究有了科学的根据。

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本草图经》的评论是：“考定详细，颇有发挥”。李时珍的伟大巨著《本草纲目》，采用苏颂的《本草图经》中的药物计有七十四种。在杂草类中更搜集苏颂《本草图经》中第二十一卷《本草外类》，即宋代中医已采用而旧经不载的有名未用的药物二十一种，其他一千多种药品的形态、辨别、产地，《本草纲目》将它录入《集解》；药物考证录入《释名》、《校正》；炮制方法则录入《修治》；药物理论列在《发明》；主要治疗作用，则列为《主治》、《附方》。凡经苏颂校正气味有不同的，或属于新的发现而纠正前人的错误的，则分别列入《气味》、《正误》。《本草图经》与明代药物相类似而名称不同则载入附录，并以“颂曰”或苏颂“图经”等注明出处。这些都是李时珍引用《本草图经》的资料。《本草纲目》可以体现出苏颂在医药学上的巨大贡献。苏颂和李时珍在医药上能取得伟大的成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使历史文献与实物标本相互验证。

（上接第81页）为党和人民作出重大的贡献。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中共福安地委和专员公署成立，并组建了各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从此，闽东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卓鸿波执笔）

注：

①②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党刊《怎么干》，1923年2、3期合刊。

③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2年10月15日。

④中共连江县委文件，1933年2月1日。

⑤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福安中心县委信，1934年1月19日。

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信，1934年1月30日。

⑦曾志《关于福建之行给耀邦同志的报告》。

⑧中共闽东特委《闽东总报告》。

⑨《闽东特委关于组织的报告》。

⑩《闽东红旗报》第十、十六期。

⑪《福建民报》，1934年9月18日。

⑫《闽东红旗报》第十六、十七期。

⑬闽东苏维埃政府《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与胜利宣言》，1934年10月15日。

⑭⑮《闽东红旗报》第十期。